

# 红砖红瓦的房子

□陈占敏

从我们老家烟台招远的那个小村唯一的東西大街往西走,出了村子向北,走向那条河东岸的大道,走二里路,就到中村了。中村是河两岸上上下下四五十里以内最大的村子,过去是个古镇,有一条别的村子全都没有的最长的大街。穿过那条大街,沿了一条南北胡同向北走,一直走到村子北头,就看见一所红砖红瓦的房子了,那就是供销社了。好多年里,那么大的村子红砖红瓦的房子就那么一所,像一个标志,那就是文明和繁华的所在。

那些年里,上中村就是现在的上深圳。中村人比现在的深圳人还要骄傲。中村早已成了人民公社的一个大队,可是中村人还愿意对人说他们是中村镇的,他们的洋洋自得令人发笑令人嫉妒,也令人隐隐地羡慕。中村的业余剧团出村演戏,他们挂起来的幕布上就赫然绣着“中村镇”这样的大字。我想,这正是因为他们的村子北头有一所红砖红瓦的房子,那所房子,多年来是这一带唯一的一个卖日用百货的地方。

小时候家里还不需要我去买油盐酱醋,可是我也愿意上中村。上中村其实也就是上那所红砖红瓦的房子里去,在柜台的外面,从房子西头走到房子东头,看摆在货架子上的那些茶缸、瓷盆、牙膏、牙刷、衣袜鞋帽、钢笔小刀,看过来看过去,一样东西也不买,两手空空地走出来。因为有了那所红砖红瓦的房子,那里也就有了别处没有的繁荣景象。

有一年上中村变得十分困难了,河东岸的那条大道上设了关卡,立了黑板,黑板上写了字,小学生拿着小棍,指了指黑板让人识字,把字识下才放入过去。那是大跃进的时候,扫盲识字像大炼钢铁一样突飞猛进。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,我被关卡上比我先上了两年学的小学生挡住,通不过去。我被他们逼着识字。他们得意的样子像中村人宣称他们是“中村镇”的一样令人嫉妒,也令人羡慕。那时候我开始懂得了,原来文化也能欺负人。

到了我上学读书,大道上的关卡就没有了,我就是有了欺负人的本事能把别人挡住,逼人识字,我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。这时候我上中村,往往是确实要买东西,比如买一个本子、一支铅笔、一块橡皮,都能成为我上中村的理由。在那所红砖红瓦的房子里,我把二毛钱交给售货员,她给我两支最不好的铅笔,就是木杆上连油色也没有的那一种。好多年,售货员都是铁着脸的那个女人,她好像从来也没有对人笑过。她似乎特别不愿意把东西卖给小学生,小学生叫她拿铅笔拿本子,她总是把铅笔本子扔到柜台上。在那所房子东头卖布的女售货员,是态度最好的一个,她长得也很美,有一双美丽的眼睛,她一笑就露出了雪白的牙齿。她一直在那所红砖红瓦的房子里卖布。我不知道供销社的领导叫她在那里卖布,是不是因为她长得美丽。

那些年上中村,就怕“关板儿”。有时候放了学,太阳就快

落了,气喘吁吁地往那儿跑,跑到中村北头,远远地看着那所红砖红瓦的房子,大门已经关上,玻璃窗上也挡上了木板——人家还是“关板儿”了。不甘心就这样回去,趴到门上,从门缝往里看,叫,央求人家开门。人家说关板儿了关板儿了,硬是不肯给“开板儿”。转到东面的那个大门外边,盼望着那个卖布的售货员会把门打开。她既然会对人笑出那样雪白的牙齿,她就不应该不理睬人的央求。可是仍然不“开板儿”,房子里头没有声息。

从前面的门叫不开,就转到后面去。后面是一个院子,院子很大,垛了一些货物,铁锅和大缸就那样放在露天里,院子的大门还没有关,可是却不敢进去。看见售货员去食堂领饭了,就更不敢开口叫他们“开板儿”了。男的女的售货员都拿着搪瓷的大碗,大碗里放了小勺,有的把小勺捏在手上敲打着铁碗,敲出又悠闲又自在的叮当响声。他们居然都不使用筷子,他们连吃面条都使用小勺,他们用小勺挖了一块咸菜,咬一口再放回碗里。

在这所红砖红瓦的房子里工作的人原来是这样吃饭的!他们才真正令人羡慕,不像中村人似的只能说一句“中村镇”的空空的大话。我在对那所红砖红瓦的房子的向往里,从此增添了新的内容,我渴望着有一天,也拿着一个搪瓷的大碗走进集体的食堂,用小勺吃饭,不再使用筷子。这种向往日久愈深,直到那所红砖红瓦的房子拆掉,盖起了更大的房子,抹

了灰色的水泥大墙,我的向往仍然没有消失。

那所红砖红瓦的房子是彻底地消失了,后来盖起的更大的房子也没有了踪影,原来的那个地方盖起了三层的楼房。我没有看见供销社在大楼开业时剪裁的热闹闹的仪式,等到我去年腊月上中村赶集,走到那个大楼跟前,那里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。与供销社大楼紧挨着的大小商店难以计数,西面不远的市场上人声喧闹。走上冷冷清清的楼梯,走过供销社大楼卖货的一楼二楼和三楼,层层都是售货员比顾客多。售货员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好,买一把指甲剪都有两个人走过来为你服务。我想起那些年的腊月集日,那所红砖红瓦的房子里,人挤得走不动,售货员需要不断地提醒大家,别挤倒柜台,别挤倒柜台!其实那时候的柜台是砖砌了底座,结实得很。

过去了寒冷的冬季,听说中村供销社的大楼卖给了私人,职工全部下岗,保留工职,到时候给办退休。作出这个决定的供销社主任是个女人。她肯定不是在那所红砖瓦的房子里卖布的那个女售货员。那个女售货员早该退休了,不会再美丽了,不会再对人笑出雪白的牙齿了。

中村,成了一级政府的所在地,改成了镇,但不叫中村镇,叫金岭镇。中村人,不再会得意洋洋地向人夸耀“中村镇”了吧?

初秋的一天,我走近了这历经一个半世纪风雨的洋关建筑群。金黄的夕阳照耀着烟台山东西领事路之间的南山坡中央地段,自东向西排列着副税务司官邸、税务司官邸、发讯台、发讯塔、高级职员公寓。

西去数步便是税务司官邸,这是几段矮墙围起的独门庭院,院内树木葱茏、花香草美、涛声回荡。官邸是青砖砌成的单层建筑,但房体高大,四周全部建有宽大原外廊,气势恢宏。

离此不远是三层高级职员公寓,这是座欧式造型的三层楼房,结构精美,青砖明线墙体,红色砖牙腰线,洁白的双开推拉式窗户,一派欧式古典建筑的韵味,宛如一座欧式古堡耸立在烟台山

## 翻读洋关

□郭锐

上。

可以说,当年洋关的这组建筑是在烟台最美的地方建起的最美的建筑,几近一个半世纪的风吹雨打似乎没有损坏它的容貌。然而,当我们拂去时代的尘埃,翻读洋关的历史,我们会深切地感到美丽的洋关是国人屈辱的见证,是一块让人心痛的伤疤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根据不平等的《天津条约》和《北京条约》,清政府被迫答应开辟登州做通商口岸。1861年,英国驻登州领事马礼逊开始对登州、烟台等地进行考察,这是一个颇有心计和知识的家伙,他考察得出的结论是,烟台港各方面的条件都优于登州,建议英国公使将通商口岸改在烟台。英国公使采纳了马礼逊的意见,并强行要求清政府将通商口岸改在烟台,软弱的清政府被迫答应。1861年,在恭亲王奕訢奏请下,咸丰皇帝下旨,烟台口岸对外开埠通商,并将登莱青道由莱州迁往烟台,同时,筹建海关监督衙门,俗称“常关”。

1862年3月,东海关监督衙门正式开关办公,辖山东5府、16州县、23海口。列强早就盯上了这块肥肉,事过一年,攫取中国海关最高权力的代理总税务司赫德,下令在烟台建立东海关税务司署,并派英国人汉南担任东海关首任税务司,“洋关”即此产生。汉南是个精通业务又野心勃勃的人。上任伊始,即在烟台山下购地建造东海关税务司公署办公楼,其后又陆续在烟台山上建起了豪华的税务司官邸、副税务司官邸和高级职员公寓、发讯房、发讯台等一系列建筑。

当时,烟台是一个繁荣的港口,西方从这里进口鸦片、洋油、洋火、洋布、洋铁等货物,中国则从这里出口草编、针织花边、花生、粉丝等各种农副产品和工艺品。烟台港和内地的来往也十分频繁,港口内常常是桅杆如林,货积如山,关税银两也如潮涌来。自东海关建立至1895年,洋关每年稽征关税总额20万-30万两,20世纪初叶,增至60万-70万两。自1901年,为抵押庚子贷款,洋关更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,烟台两侧25公里的八角等海口被列入洋关的征收范围。1931年后,征收范围进一步扩大,以荣成石岛为界,沿海岸线向西,至黄河入海口,全部由洋关征税。

洋关税务司从英国人汉南开始,继而是英国人卢逊、好博逊、美国人杜德维、德国人德翠林、法国人伯罗德……后来又又被日本人强占。税务司走马灯一样换着,但就是没有一个中国人。不但税务司、副税务司是洋人,所有高级职员也都是外国人。这些洋员们白天在税务司公署大把大把地征收白银,夜晚回到官邸和公寓,逍遥享乐,享受着种种特权。这是一段多么令人心痛辛酸的历史!

黄昏中,烟台山上的洋关建筑群是安静而优雅的,永远没有了税务司“叫班”的声音,也没有了洋员们围坐在壁炉旁举杯相碰的闲雅,但它承载的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沉重的记忆。

从烟台山上下,漫步约10分钟,就来到了当年的东海关税务司公署,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层建筑,红瓦坡顶,西式门窗。楼下为东海关税务司公署验货征收处,楼上为税务司、检察长和高级职员的办公室。当我走进二楼的一间宽大的房间时,海关人员告诉我,这就是当年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签订不平等的中英《烟台条约》的地方,这又是一块令中国人心痛的历史。

走出税务司公署,已是暮色苍茫,回望这座洋关,似乎显得更加凝重和森严。翻读这段洋关的历史,让人悲怆和压抑,但它让人明白和记住了“弱国无外交”和“国贫受辱”的道理。



▲ 烟台月亮湾景区。

# 港城的项链

□王月鹏

到过烟台的人,大抵是不会错过滨海景区的。这是港城烟台一条美丽的项链。

滨海景观带、历史文化街区、广场群、高层商务区……漫步滨海景区,你会同时体味到自然与人文,古朴与现代。被海浪冲洗去了的,不仅是岁月的风尘,还有你的疲惫或忧思。

曾经见过一幅老照片:刀削一样干净利落的街面,一排笔直的树立在中间,两侧是零星的楼房,不高,但很庄重。车辆像饰品一样点缀着街面。没有广告牌,没有霓虹灯,甚至没有太多的行人。仅仅是一条街,一条单线街的,并不宽阔的街道。在它的上空若有若无地漾着海的气息。

这幅照片所保存下来的,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烟台。它简单得令人珍视,简洁得让人心安。一晃20多年过去了,这座城市也已容颜改变,甚至让人不敢相认了。

在我的心中,这个滨海城市是随意的,也是性情的。我相信,很多生活在这里的人也会像我一样淡忘了它的存在,更多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但是,不管做出怎样的选择,这个城市都给你准备好了相应的理由。

海是不可解释的。可以感受,可以想象,唯独不可解释。栈桥深深地懂得这些。

沿着滨海路海岸线蜿蜒前行,落日在天交接处静静地浮着。栈桥依旧,沿着暗色的栈桥,我走向更深的暗色。那是力量的源泉,是让一个人身心宁静的地方。我喜欢栈桥,喜欢它欲言又止的样子,这让我一次次地走向它。独立栈桥,迎着海风,我不知道是海水充盈着沉默,还是沉默充盈着海水。夕阳已经沉没,海的余温让人心动,让人想象晨曦是怎样再次托起这个城市。

城市淡远了。烟台山与海相依相偎。没有了想象,只剩下海,

一波波的海水簇拥着栈桥,包围了我。我说不清自己,就像看不清这海一样。生活有很多可能,我还会有什么样的可能?

栈桥附近,有一个叫做月亮湾的地方。那是一片弯月形海湾,一道宽约一米、长二十余米的海堤,静静地探进了海里。这是我心中的另一道栈桥。在它的尽头,是一座不锈钢制的月亮老人雕塑。这里成了青年人谈情说爱、海誓山盟的地方。

这片弯月形的海湾,与冰心老人的童年紧密相连。上个世纪初,月亮湾南面的山坡上是一座清朝海军的训练场,它隶属于烟台海军学堂,校长是一位参加过甲午海战的海军军官,叫谢葆璋,福建人,1903年偕妻子和3岁的女儿来烟台创办了这所海军学堂,全家人在这里一住就是8年。他的女儿时常独自一人来到月亮湾,听着生生不息的涛声,看着由远而近的一排排浪花,静

静地等待着父亲的归来。

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蜚声文坛的女作家冰心。营房、旗台、炮台、码头和周围的海边山上,成为她童年时期的活动舞台。后来,她在《忆烟台》一文中这样写道:“一提起烟台,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方八面涌来……但是,关于烟台,我还能说些什么呢?我童年时代的烟台,七十年前荒凉寂寞的烟台,已经从现代人们的眼中消逝了。今日的烟台是渤海东岸的一个四通八达的大港口,它朝气蓬勃、容光焕发地正忙着迎接五洲四海的客人。它不会记得七十年前有个孤独的孩子,在它的角海滩上,徘徊踟蹰,度过了潮涨潮落的八个年头。”

潮起潮落。我们穿越时间和空间,来到滨海景区,来到这个被誉为“城市会客厅”的地方,漫步,远眺,想一些什么事情,或者什么都不去想,只是静静地走着。在这里,海是懂你的。